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身份越来越特殊，它已经成为贸易大国、投资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与西方做法有本质区别。所以，中国是多元世界的重要平衡元素。中国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必是“善其身”并“惠天下”。

在全球经济增速连续数年放缓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更关注区域内外部的全面竞争。当美欧等国家重提振

兴制造业和再工业化，日本主动进行日元贬值，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渴望提升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寻找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增长点。出口竞争已经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抓手之一。

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出口大国的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却主动放缓出口增速，加大进口和对外投资，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再平衡。IMF的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四年，中国以不到全球 1/10 的经济总量贡献了近 1/4 的全

球经济增长量。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实干有力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诠释了“发展”这个人类的共同梦想。

目前国际上有三种论调：一是捧中国为经济大国，而要求中国承担额外责任，或专门针对中国的任何反对或异议，动辄将之上纲上线；二是贬损中国的发展模式，故意将国内失业或经济问题推托到中国身上，矛头总是指向逆差或汇率问题；三是唱衰中国经济，将企业杠杆失衡、地方债务、头寸紧张、股市大跌等都指称为金融危机前兆。对这三种论调

中国都应当清醒认知，并据理反驳。

习主席指出：“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的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纷繁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始终积极发挥其“负责任的大国”的引领作用。事实上，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全球经济稳定，中国应广泛团结和联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经济体承担起保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共同责任。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大国，

因此中国将继续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当然也不否认，中国也是贸易大国和引资大国，因此，中国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将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国会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的，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促

进共同发展，努力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力量对比与超经济考量的布局呈现出历史性的转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梦与世界梦共同实现的联结点。更积极更全面地参与和引领，应当是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定位。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华东九报好新闻竞赛
我的中国梦

“副处级”的“用场”

凌河



已晚谭

李娜近又发飙，怒斥记者，责骂网民，于是有媒体，教其“注意素质”，于是舆论之间，要其“托牢下巴”，还看到一篇这样的“规劝”，提醒李娜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副处级”干部，要有“身份感”云云。

这不是很奇怪吗？不是说李娜是个“个体户”，是个特立独行于体制外的“自由人”么？她怎么是个“副处级”？——说来还真是的，两三年前李娜法网捧得金杯，省市给了钱不算，还经“研究”，封李娜为“省网球管理中心”的副主任，是一个“副处级”。尽管当时的舆论，说李娜的训练比赛，日程早已排满，哪有什么时间和精力来“管理”这个“中心”？更说李娜早已“单飞”，这顶乌纱帽难道足以把她拖回来？总之炮轰砖拍，说这又是“老一套”，官本位，但“副处级”的乌纱，最终还是发了出去——其实这个“副处级”，又岂止一个李娜？黄穗因为跑到国外去打球，所以引出了轩然大波。国门打开以后，跑出去打球有什么可以沸反盈天的呢？因为黄穗也是一个“副处级”，国际夺冠归来，就封了她“省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一个“副处级”，而且还按级别拿着“官饷”，居然代表外国打球，当然就要动众怒了。其实黄穗这个“副处级”，一天也没有上过班，一日也没有视过事，但乌纱帽，是一直戴在她头上的。

这顶“副处级”的乌纱帽，近年以来，几成惯例，拿了金杯回来，即刻戴上“副处级”乌纱，成了“从七品”的“官员”的，岂止李娜黄穗？田亮还在备战北京奥运，就“给予”了“副主任”的头衔，可是“亮晶晶”也不能只“提拔”一个啊，于是郭晶晶也被封为“副处级”，哪怕她还在跳台

跳板上驰骋现场。拳击大王邹市明，还在准备征战伦敦奥运会，就成了“副大队长”，一个相当于“副处级”的“领导岗位”，而某省一下子把9名奥运冠军“一次性”全部提为“副处级领导干部”，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据说“副处级”是一种“激励”，乌纱帽是一种“奖励”，于是“副处级现象”，就不只是体坛才有。高校里头，讲课讲得精彩的，我们会“即刻”把他封为“副主任”甚至“副院长”，让他立马做一个“副处级”；研究所里头，学问做得好，我们也总要让他“上一个台阶”，做一个“副处级”的“官”。流风所至，最奇怪的，还是学术界里，象牙塔中，竟然讨论鲁迅的“级别”——说鲁迅固然是社会教育司一科的科长，看似只是个“正科级”，但他又兼教育部的金事啊，经反复考据，这个“金事”，相当于“副处级”，于是“鲁迅也是个副处级”，是个“从七品”，不像孙犁，一辈子都只是个“正科级”，于是抚掌相庆，引为“同级”，似乎与先生成了一个“阶级”的同道。

“副处级”据说是很有“激励作用”的，但不料它还有别样的用场——比如不久前，湘潭县80后的副县长徐韬，被曝光系“火箭提拔”，网上义愤填膺，媒体大事讨伐，于是不由分说，赶紧摀掉他的“副处级”，“按科级安排”，至于徐韬为什么会“一飞冲天”，什么人将他“火箭提拔”，就再也没有了下文。例如徐韬这样的一夜提拔又一夜免职，其实还有数例，不但摀掉了“副处级”，还有打回原形、一贬到底的，似乎拿了一顶“副处级”的乌纱“谢了天下”，就可以平民愤，也可以保护更多人的乌纱——一个“副处级”，原来戴上去容易，摘下来也不难啊。

真没想到，一顶“副处级”的乌纱，还能派这样的用场。

礼仪之邦君子之泽

朱绩崧



北窗絮语

上周某日，和两位朋友碰头，他们都带来了还没上学的孩子。“来，叫叔叔！”朋友甲命令他的女儿。朋友乙跟着催促儿子：“来，快，叫叔叔！”两个孩子站到我面前，毕恭毕敬，高开金口。男孩说：“大便叔叔好！”女孩跟着一句：“小鸡鸡叔叔好！”还没等我小吃一惊，两小童已笑得前仰后合。我那两位朋友皱了皱眉，摇了摇头，一边谈天说地去也。剩我独坐，哭笑不得。

无独有偶。前阵子，我去某好友家做客，他那还在读幼儿园大班的千金也是喜欢把人体排泄物和生殖器官挂在嘴边的。我对好友说：“是不是该管管？否则大了还怎么了得？”好友一瞪眼：“你做大人的，能不能宽容点？谁小时候没有疯过？孩子需要自由地发展。再说啦，这是我的女儿，她是好是坏，我负责！”——丽丽，回房练钢琴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练习曲悠扬地奏了起来，却让我陷入沉思：孩子就该这么“自由地发展”下去吗？我们这辈做家长的，赶上好年景，算受过点所谓高等教育，有的还是硕士、博士，海归，为什么就不能培养出文质彬彬、知书达理的孩子呢？就在我自己都没能理出个头绪之际，好友端了茶来，坐在边上，一拍我肩：“现在的孩子，不都是这样活泼吗？”恕我无言以对。

就在前天，我走在毒日炙烤的福州路，行到中国银行门口，一位拎着两包书的少年拦下我问路，他要去坐二号线。我叫他往东到山东路再左转，说完便要走，谁知他道了声谢，还对我浅浅鞠一躬。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升起了希望，感到咱这

“礼仪之邦”不完全是自吹，后辈中确有“不都是这样活泼”者，谢天谢地！

身为大学教育工作者，听到同事感叹“现在的大学啊，真没礼貌，觉得老师、学校为他们做的，全是理所当然，不知感恩”，那是隔三差五的家常便饭。可从小学到高中，至少从新闻报道来看，我们是越来越注重德育了呀。那问题会不会出在家庭呢？我没有做过统计，无发言权。但是，请允许我提醒那些热衷于把学龄前稚童往钢琴班、英语班、书法国画班塞的家长，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习以修身养性的，如果只为升学加分之用，而罔顾“身”、“性”，舍本逐末，必然沦为末技淫巧——近年骇人听闻的药家鑫案，虽系极端，警响不息。我们用总设计师他老人家的“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一股脑儿造出很多句子，兴旺了培训市场，但很少听到有说“素质要从娃娃抓起”的。

其实，也难怪，因为素质实在无从抓起。给孩子报个国学班吧，发现是大忽悠。让孩子去游趟学吧，又担心那是“纯玩团”。可为何非要刻意营造一片不能持久的小环境，逼着孩子切换生存模式，去适应片刻，再返回日常生活，故态复萌呢？这样培养素质，效果显然无异于纸上谈兵。还真不如平平淡淡，在柴米油盐之际，于洒扫应对之时，家长以身作则，严慈共济，恩威并施，在孩子性格最易塑形的阶段，合理督促，有效干预，等孩子能自觉走上正轨，不偏邪道了，再由他“自由”、“活泼”地发展去，岂不更好？否则以一个家庭之细小，君子之泽，二世而斩，即如某老艺术家那官司缠身的贵公子，则大而言之，何从谈起今日之中华民族亦“礼仪之邦”哉？

等到真相，才能等到希望

李泓冰



余烬录

炎炎盛夏，赤县溽热，无论南北，西瓜是最消暑的佳果。能安坐在空调房里，吃上冰爽沁脾的西瓜，要归功于瓜农们烈日下的辛勤耕耘，也归功于瓜贩们的起早贪黑。但我们绝不曾想过，这西瓜上，还可能沾血。

7月17日上午，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分，湖南临武的瓜农兼瓜贩邓正加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的家人说，他是被城管暴力执法围殴至死；而临武县委县政府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与邓正加发生争执，“邓突然倒地死亡”。

又是各执一词，一时间舆情汹汹。目前，邓正加死亡真相还在潜伏中。没有真相，便没有原谅——有媒体在对另一事件报道时以此为题。事实上，没有真相，不光谈不上原谅，更令公众对更多事件的真相失去信心和希望，加剧社会对立情绪，甚至会将怀疑扩大到官员并未说谎的领域，极大地增加社会互信成本。

公众对农民邓正加死亡事件的高度关注，不仅仅在于生死大焉，生命权高于一切，也在于公众对真相的孜孜以求，对公权力及其公信力的不懈拷问，对百姓生命尊严的坚决捍卫。

类似临武县政府这样的语焉不详，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一些基层政府在负面事件面前闪烁其词遮蔽真相，几乎已成本能。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一个农民在被执法中的突然死亡，调查真相应该并非十分困难，但是，临武接下来的一幕，让本已心生疑虑的公众越发要喊出“我不相信”了。这回被殴的是采访邓正加之死的记者，采访车和手机被砸，打人的是临武警

察，扬言“要拍就让你死在这里”。

难道，真相真的这么可怕，需要用新的人命去遮蔽？为什么一个基层政府宁愿用棍棒盾牌去阻止对真相的探索？

与邓正加死亡相似的事件，早已不是孤案。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经常发生在一些偏远的、交通不便且经济欠发达，平时也鲜有抛头露脸机会的县城。桐柏山腹的临武，除了邓正加事件，几乎没有媒体光顾。天高皇帝远的山区县，比之媒体活跃的大中城市，公权力更容易缺乏监督，有些执法者便渐渐嚣张起来，关起门来为所欲为甚至称王称霸，这就极易激发负面事件，一旦出了事儿，他们的惯性思维也是努力捂住真相，摆平一切。

不独是临武，它和它的同在山区的芳邻，堪称按下葫芦起来瓢，出名的时候都带着狼狽。临武的南邻广东连州去年发生近百名儿童血铅中毒，被遮蔽了长达10年的发电厂污染严重超标真相才被揭开；它西北的邻居嘉禾县，则因为数年前的大面积高考舞弊案而暴得大名；东邻宜章则发生过地产商野蛮施工，甚至向村民扔手雷、发火銃致人受伤的恶性事件……

无法无天的地方，监督稀缺，真相也稀缺。需要高度重视一些偏远的中西部县域基层政权公信力的崩坏，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自鸣得意，该到了被彻底阻止的时候了。阻止的第一步，就是在法律与制度的介入下，对真相的彻底解困。

只有瓜农邓正加之死等到真相，以后的“邓正加”们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有信心 and 希望，而遥远的我们也能在品尝西瓜时不再脊背生寒……